

寧夏社會科學院 編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西夏文獻

①

Xix 1.01 - Xix 3.14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二〇〇五年·上海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西夏文獻. 1/寧夏社會科學院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8
ISBN 7-5325-4204-1

I. 中… II. 寧… III. 歷史—文獻—匯編—中國—西夏 (1038~1227) IV. K246.3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 (2005) 第084078號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西夏文獻①

編者 寧夏社會科學院

寧夏銀川市西夏區 郵政編碼 750021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印製 上海展強印刷有限公司

中國國家圖書館底本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圖版版權 © 中國國家圖書館

文本版權 © 寧夏社會科學院

上海古籍出版社

開本 787×1092mm 1/8 印張 四一·五

插頁 三五

二〇〇五年八月第一版 二〇〇五年八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5325-4204-1/K·767

Xi Xia Documents Collected
in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①

Xix 1.01 - Xix 3.14

Compiled by
Ningxia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05.Shanghai

Xi Xia Documents Collected in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Volume 1

Participating Institution

Ningxia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Publisher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Printer

Shanghai Zhan Qiang Printing CO., LTD.

Plates Copyright

©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Texts Copyright

© Ningxia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e contents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s

8 mo 787 × 1092mm

printed sheets 41.5 insets 35

First Edition: August 2005 First Printing: August 2005

ISBN 7-5325-4204-1/K·767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西夏文獻

編者 寧夏社會科學院

主編 李範文
副主編 景永時 薛正昌 府憲展

監製 吳海鷹 王興康

責任編輯 劉景雲
裝幀設計 嚴克勤

Xi Xia Documents Collected in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PARTICIPATING INSTITUTION
Ningxia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EDITORS-IN-CHIEF
Li Fanwen
DEPUTY EDITORS-IN-CHIEF
Jing Yongshi
Xue Zhengchang
Fu Xianzhan

SUPERVISOR
Wu Haiying Wang Xingkang

EDITOR-IN-CHARGE
Liu Jingyun
COVER DESIGN
Yan Kegui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西夏文獻總目錄

序言

馬啓智

導言

李範文

編例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西夏文獻

附錄

Contents

Preface

Ma Qizhi

Preface

Li Fanwen

Editorial Notes

Xi Xia Documents Collected in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Appendices

序言

西夏，是與宋、遼對峙并存一百九十年的封建政權（1038—1227）。如果按《宋史》所載，從雖未稱國而王其土的拓跋思恭建立的夏州政權（881）算起到西夏滅亡（1227），歷時三百四十七年，這要比北宋（960-1127）和南宋（1127-1279）加起來三百二十年還要多二十七年。在這期間，西夏統治者不但建立了橫跨西北疆域、延續時間較長的統治政權，而且創造出燦爛奪目的西夏文化。當一代天驕成吉思汗的鐵蹄第六次無情地踐踏這塊美麗富饒的土地時，昔日「東盡黃河，西界玉門，南接蕭關，北控大漠」、地方「二萬餘里」、雄踞一方的西夏國，在蒙古大軍的重重圍困之中走到了它的盡頭。戰爭、地震，再加上血腥屠城，西夏王國從此灰飛煙滅。直到1909年，沙俄大佐科茲洛夫來我國黑水城，從古塔中掘走大批西夏文獻，才又翻開沉寂了數百年的西夏歷史和曾經輝煌過的西夏文化。西夏古塔是一座擁有各種書籍、文卷和抄本的完整書庫。這些文獻具有特殊的世界意義。但是由于種種原因，中國學者真正見到這批文獻時，已是近八十年後的1987年。

寧夏是西夏國的發祥地，銀川是西夏的國都所在地。1958年，寧夏回族自治區成立。1960年便有人從北京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自願奔向寧夏，研究西夏語言文字。1961年又有一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同志來到寧夏，開始對西夏歷史資料進行搜集整理和研究。1972年，在自治區經濟情況并未好轉的情況下，自治區政府撥巨款資助試掘西夏皇陵，並指定專人分工負責，有的搞考古發掘，有的搞資料搜集，有的搞語言文字研究，為撰寫《西夏通史》作準備。三十年過去了，我們的考古發掘取得重大進展，現在寧夏博物館西夏展廳和西夏博物館的大批西夏文物，大部分是寧夏西夏

考古工作者數十年努力的結果。韓蔭晟先生的五百餘萬字的《黨項西夏資料匯編》已經出版，李範文教授榮獲吳玉章人文社會科學優秀著作獎的《夏漢字典》亦已出版，《西夏通史》付梓在即。目前，寧夏的西夏學者正在同國內外西夏學者同心協力主編《西夏學大辭典》，總結百年來西夏學研究的成果，這是承前啓後又一部里程碑式的巨著，希望早日完成。

早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初，寧夏學者想通過各種渠道將俄藏西夏文獻拍攝回國，並在中國出版。八十年代我們又派學者從英國拍回英藏西夏文獻。如今，俄藏和英藏西夏文獻已在我國陸續整理出版。寧夏的西夏學者爲此做了大量鮮爲人知的工作，他們沒有辜負自治區黨委和政府的囑托，他們不計個人名利，甘心坐冷板凳，數十年如一日，辛勤耕耘，爲西夏學研究及發展做出了傑出貢獻。這種默默奉獻的精神，正是我們今天提倡的學習榜樣。他們中有的人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忘我工作，做出了令國內外學術界矚目的成績，還未及享受今天美好幸福的生活就已離開了人間，在這裏我向他們表示深深的懷念，並表示崇高的敬意。

出版中國館藏西夏文獻，是我區文化建設的一項重要工程，自治區財力並不富裕，但我們大力支持這項工程。我希望寧夏的西夏學者，團結區內外的專家學者，同心協力，出色地完成這一光榮任務。我還希望我區的西夏學者堅持「古爲今用」，將西夏文化變爲產業，爲我區的旅遊業服務，使西夏文化再現昔日輝煌。

寧夏回族自治區主席 馬啓智

二〇〇五年三月八日

導言

1972年元月，周恩來總理視察中國歷史博物館見到西夏文時，問陪同他的國家文物局局長王治秋：「現在有沒有懂西夏文的人？」王答：「僅兩位老人了。」總理語重心長地指示：「一定要有人學習研究這種文字，絕不能讓它失傳。」同年三月，寧夏文化代表團赴京參觀，王治秋傳達了總理的指示，並說：「寧夏是西夏的發祥地，你們那裏一定要指派人學習西夏文，研究西夏史。」對此自治區黨委和政府十分重視。

1973年6月，當我去中國圖書進出口公司購買原蘇聯的西夏文圖書時，答復：要經外交部批准。我即携公函去外交部，東歐司文化處李輝先生接待，他答：「需省委第一書記批准後方能購買。」為此我誓言：不把俄藏黑水城西夏文獻出版，死不瞑目。

1989年，經過多年努力，終於邀請俄羅斯東方研究所列寧格勒分所所長彼得羅相教授、副所長克恰諾夫教授，來寧夏簽定共同整理出版這批「具有頭等重要國際意義」的西夏文獻，後因故擱淺。

199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從俄方得知這一消息，派副社長兼副總編李國章先生及編審李偉國先生代表社長魏同賢先生赴寧簽定與寧夏、俄羅斯三家共同整理出版《俄藏黑水城西夏文獻》協議書。如今《俄藏黑水城文獻》、《英藏黑水城文獻》陸續出版，中國館藏西夏文獻如何？

1987年，我在匈牙利國會圖書館見到英國學者格陵斯坦編輯，他在印度出版了北京圖書館藏西夏文獻，然而連一部樣書亦未給中國。後來得知文革期間他從印度來，毛澤東主席接見，他向毛主席提出，經毛主席特許而在印度出版的。

1996年，我訪日歸來，曾向國家圖書館特藏善本部主任黃潤華先生提出整理出版這批西夏文獻。2000年，我再次同黃先生洽談後，向寧夏大學張奎校長、寧夏人民出版社丁思儉社長致函，希望他們申請經費出版這批文獻，均未果。

2004年6月，我致函自治區黨委陳建國書記，陳書記與馬啓智主席均作了批示：財政廳撥專款，責成寧夏社科院整理出版中國國家圖書館藏西夏文獻，經過八年努力，終於有了結果。

一

從党項羌的興起、內遷，到西夏王朝的建立和發展，党項羌族在與西北地區的漢、藏、回鶻、契丹等民族長期交往與共同生活中，吸取了各民族的先進文化，從而創造了獨具特色的西夏文化。西夏王朝建國前夕，在開國皇帝李元昊主持下，命大臣野利仁榮仿漢字創製了記錄党項羌語言的「番書」，即西夏文字。作為西夏文化的載體，它構成了西夏文化的重要特色與標誌。西夏文創製後，國家下令在國內大力推進，「凡國中藝文誥牒盡易番書」。國家用西夏文傳送公文，頒布法典，組織翻譯佛教經典和漢文儒家經典，如《論語》、《孟子》、《爾雅》、《孫子兵法》等。西夏學者用西夏文記載國史，著書立說。從傳世的西夏文物文獻來看，西夏文字的使用已普及深入到民間日常生活的一切領域，諸如案件審理，用以土地買賣的契約文書、借貸文書、記事、曆日、占卜辭以及用于碑刻、題記、印章、錢幣、符牌文字等。西夏文字是西夏王朝時期重要的廣泛使用的實用文字工具之一。

西夏王朝以佛教立國，佛教是西夏的國教。據漢文史書記載，西夏王朝從建國前的李德明時期，經景宗元昊、毅宗諒祚，到惠宗秉常，曾向宋朝遣使進貢良馬贖取漢文佛教大藏經。又據西夏文獻記載，西夏從景宗元昊開國始用西夏文翻譯漢文佛經，至崇宗乾順止的五十三年間，譯成了三千五百七十九卷，共八百二十部西夏文佛經，被後世稱為「西夏文大藏經」。

豐富而獨具特色的西夏文獻，在成吉思汗軍隊鐵蹄的踐踏和戰火洗禮中幾乎蕩盡了。而為蒙元王朝的建立和統治立下汗馬功勞的西夏移民，使西夏的佛教文化得到了傳承。所謂元代大量刊刻「河西字大藏經」，即「西夏文大藏經」，已成為元代佛教文化的一道亮麗的風景綫，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明朝中葉。

至遲到明代中葉以後，西夏和西夏文化便逐漸被歷史所遺忘。清末武威學者張澍（1776-1874）于清嘉慶九年（1804）在武威大玄寺大殿後院碑亭中發現的立于西夏天祐民安五年（1095）的西夏文漢文合璧《涼州重修護國寺感通塔碑銘》，

使西夏文在沉睡三百年之後又一次重見天日。

從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西方學者從釋讀西夏文字興起的「西夏學」首開其端。從1908年起，以俄、英等國的探險家柯茲洛夫、斯坦因等人率領的探險隊，相繼在我國黑水城遺址（今內蒙古額濟納旗境內）發掘大量西夏文獻，被運往俄、英、法、德等國，使國際「西夏學」大興。以俄藏黑水城西夏遺書為例，到上世紀六十年代的整理編目已達八千餘編號，總數在十數萬件以上。其文獻內容除相當數量極其珍貴的西夏時期西夏文世俗文獻外，佛經文獻占總數的80%以上。由于保存在國內的西夏文獻資料的匱乏，我國的西夏學一直處于停滯或落後的狀態。從上世紀六十年代起，國家開始重視我國西夏學的研究和發展。北京、寧夏和甘肅等地已安排專人學習西夏文字和歷史，大力開展西夏故地寧夏、甘肅、內蒙古等地的文物探尋與考古發掘工作，發現了許多重要的西夏文物遺址、遺迹和相當數量的文獻資料。如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等河西地區的西夏石窟群，寧夏銀川賀蘭山的西夏皇陵，遍佈于寧夏境內的西夏寺廟、佛塔遺址，而新發掘或發現的西夏文獻如寧夏靈武縣、寧夏賀蘭山拜寺溝方塔遺址，甘肅武威張義堡下西溝峴山洞和武威纏山北麓玄母洞寺都發現過一定數量的西夏文獻。此外在敦煌莫高窟，內蒙古額濟納旗黑水城遺址，寧夏的西夏時期寺廟、佛塔遺址，也發現和清理出許多種西夏時期的文獻。這批新發現的西夏文獻與早年已收藏入國家圖書館、中國歷史博物館、北京故宮博物院以及地方博物館、圖書館的西夏文獻組成了中國館藏西夏文獻的規模。

二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西夏文獻的來源有兩個部分：一是1929年秋入藏國立北平圖書館的寧夏靈武出土的西夏文佛經，這是館藏西夏文佛經的主體。以尚存經名或可考的完本或殘卷計有：(1).《慈悲道場懺罪經》九卷；(2).《地藏菩薩本願經》一卷；(3).《大方廣佛華嚴經》共六十一卷；(4).《金光明最勝王經》共十五卷；(5).《說一切有部阿毗達磨順正理論》一卷；(6).《悲華經》一卷；(7).《經律異相》一卷；(8).《添品妙法蓮華經》一卷；(9).《不空羼索神變真言經》一卷；(10).《大悲經》一卷；(11).《大智度論》一卷；(12).《現在賢劫千佛名經》一卷；(13).《過去莊嚴劫千佛名經》一卷；(14).《佛說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密多經》一卷；(15).《佛母大孔雀明王經》一卷；(16).《菩薩地持經》一卷。以上粗略統計九十九卷，均出自寧夏靈武。二是俄國探險家科茲洛夫于1908-1909年所獲黑水城遺書中的西夏文《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共二十一卷，于1957年由前蘇聯政府「捐贈」給北京圖書館。此外還有北京圖書館藏的西夏文《六祖大師法寶壇

經》殘頁。國家圖書館所藏西夏文獻，據最新公佈的數字，「總計二十多種，有一百餘卷，約有數千頁面」。

靈武出土的西夏文佛經最早見于著錄的是，1932年1月《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四卷第三號《西夏文專號》，其《啓事》云：「民國十八年秋，本館購入寧夏發見之西夏文佛經百餘冊，皆屬宋元舊槧，蔚然成爲大觀。」同年，王靜如在《西夏研究》第一輯《引論》中亦有類似的記載：「1929年春季，有人歸自寧夏，携有夏文經籍，共有九十餘卷之多，後由北京圖書館巨價購得。」但都未講清楚靈武文獻出土的時間、地點及入藏情況。

靈武出土的西夏文獻的數量現在還不是很清楚。據已見諸家著錄與報導，確知國家圖書館的收藏品仍爲劫餘之物。如1936年慕壽祺著《甘寧青史略》卷二十九：民國六年（1917）丁巳條載：「九月，寧夏靈武發現西夏寫經。」注云：「至是，靈武縣知事余鼎銘修城，于城牆內掘獲西夏寫經兩大箱，毫無損壞，送往寧夏鎮守使署。」時隔四十多年後，曾收藏靈武出土西夏文《華嚴經》的甘肅張思溫（1913-1996）于1957年和1979年，分別撰文記述：「此經函袱內有近人馮國瑞跋記略云：「聞之臨夏張思溫兄尊人質生先生：安康人余鼎銘字介彝，民八（？）知靈武縣知事，于近郊番寺旁農人耕地得明布政使王驥墓誌及五瓦罍，內藏夏文經甚多。介彝獲此罍藏，以多帙贈馬，以此五冊贈張，遂得保存至今。馬所藏早已分散無考。」（文見《張思溫文集》，甘肅民族出版社，1999年）據張思溫的文章考證「余鼎銘于民國五年至六年任靈武知事」。此經出土時間以《甘寧青史略》記載爲是。明王驥，死不葬靈武，亦未嘗爲布政使。至于出土地點有「近郊番寺」與「城牆內」兩說，也尚有其它傳聞。

另一位收藏靈武出土西夏文《華嚴經》的羅雪樵（1903-1986）撰文稱：「民國八年（1919年）靈武縣長余鼎銘以縣長身份，發掘了縣城內西南隅一座佛寺遺址院內的一座教爐，從中挖出了：原版夏漢對音對義字典《番漢合時掌中珠》一本，《大方廣佛華嚴經》若干部和手寫作品一本。」羅雪樵回憶說，《大方廣佛華嚴經》數量較大，他的朋友靈武人王柱曾親眼目睹說：「裝了四大箱，余縣長運到上海賣了。」羅認爲：「這是一種猜測之詞。因爲馬福祥（時任寧夏護軍使）曾以此送給過其親近和幕友。」如前述張思溫之父張質生。「有人說還送給了韓復榘一部分」。又說：「這部佛經散落在靈武居民手裏也不少。民國三十六年（1947）我買到的三本——二十六、五十七和七十六卷，就是從一個靈武人手裏買的。其中的七十七本爲別人買去賣給了北平圖書館。」（羅雪樵《我所知道的在寧夏境內出土發現的西夏文物》，載《寧夏文史》第一輯，1986年）。

簡言之，1917年寧夏靈武城郊佛寺（或城牆內）出土的「五瓦罍」西夏文獻以佛經爲主，其中又以西夏文刻本《大方廣佛華嚴經》爲大宗。靈武西夏文佛經出土之日就遭散佚，在北京圖書館收藏的十年前，其中僅《大方廣佛華嚴經》八

十卷本的不同卷次就已落入地方官員、民間人士和收藏家（見後文）之手，有的更是流落到國外，如日本。

三

系統整理和著錄入藏國家圖書館的靈武出土西夏文佛經首見于1932年出版的《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四卷第三號《西夏文專號》，由佛學家周叔迦《館藏西夏文經典目錄》編成一百號，著錄靈武西夏文佛經計十三種近百卷。有記載西夏文漢譯經題、題款和裝幀、版本、規格等內容的敘述。其後羅福蓀撰《西夏圖書略說》（《待時軒叢刊》本），附錄周叔迦《目錄》，對同類的佛經區分出不同版本。

據王國維《觀堂集林》卷二十一載：《元刊本西夏文華嚴經殘卷跋》云：「上虞羅氏、仁和邵氏并藏西夏字經折本，每半番六行，行十七字。首行題『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與國家圖書館及張思溫、羅雪樵諸家所藏《華嚴經》，其版本款式、行字、題款等完全一致。上虞羅氏即羅振玉，其子羅福蓀，于公元1921年因病夭亡。王國維為其作《羅君楚傳》中稱：君楚所釋《華嚴經》刻本，余於其歿後數月始得考定為元初杭州所刊《河西字大藏經》之一。」時為1922年，「君楚所釋《華嚴經》刻本」即羅振玉家藏。

據王引《館刊》載羅福成撰《附各家藏西夏文書籍略記》記載：

「《大方廣佛華嚴經》，杭縣邵氏藏，首尾完全無缺。存第一卷至第十卷，共十冊」；

「《大方廣佛華嚴經》，上虞羅氏藏，首尾完全無缺。存十六卷至第二十卷五冊」；

「《大方廣佛華嚴經》，上虞羅氏藏殘本。存第二十一卷，首缺一頁半，尾全。……按此卷與館藏（三十二號）同，館藏存首卷一頁半，此卷所缺亦一頁半，兩者當能含接，且必為白綿紙印本。稍後以上板心行款悉與館藏同，即不詳記。」

又，上虞羅氏藏殘本《不空羼索神變真言經》，羅氏存「十八卷第十九板一頁十二行，任字頭」。周叔迦《館藏目錄》第二十一號正缺此頁。且兩者「行款板心無一不同」。說明羅氏存此殘經同國家圖書館所藏之該經同樣出之靈武之散佚。

由此可見，1917年靈武出土的西夏文《大方廣佛華嚴經》的絕大部分和其它西夏文佛經，至1929年輾轉入藏北平圖書館。此前，至遲在1922年散佚出來的靈武佛經中《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一至卷十共十冊全卷，為杭縣邵氏收藏。卷十六至卷二十五全卷，卷二十一之一頁半殘卷，以及《不空羼索神變真言經》殘卷為上虞羅振玉收藏。這些部分正好是北京圖書館《館刊》周叔迦《目錄》中所缺，或所殘存的部分。

靈武出土西夏文佛經流失海外部分現在尚難作出明確的統計和記述。根據已見著錄可以推定，日本收藏的西夏文《華嚴經》卷一至卷十、卷二十六共十一卷亦出自寧夏靈武。據1980年，日本西田龍雄撰文稱：「昭和初期，京都大學購進《大方廣佛華嚴經》，可能北京圖書館也是用同樣的辦法購進的。」他還轉引日本石濱純太郎的文章說，這些經「一說在肅州（今甘肅酒泉）收集的」。昭和初期為公元1926年之後，購于今甘肅酒泉，符合于靈武出土佛經散佚的時間與地區（西田龍雄《關於西夏之佛經》，譯文見《西北史地》1983年第一期）。1975年至1977年，日本京都大學出版了西田龍雄著《西夏文嚴華經》第一、二、三冊，收錄日藏十一卷西夏文《華嚴經》漢文對譯和譯文注釋及傳世西夏文佛經目錄等。日本所藏與國家圖書館所藏的《華嚴經》版本，形制完全一致。故可以判定其為靈武所出，且《華嚴經》卷一至卷十原為仁和邵氏所藏而流失日本的。另外還應提到，西田龍雄于1957年至1958年所撰《關於天理圖書館收藏的西夏語文書》中提及，日本人從張大千手中購入的西夏文佛經殘片有《大方廣佛華嚴經》八十卷本的卷九、二十二、四十的殘片；《金光明最勝王經》卷二、三的殘片；《慈悲道場懺罪法》卷十的殘片。這些都是國家圖書館靈武藏品中已有的西夏文佛經。疑張大千手中也收藏過靈武出土的西夏文佛經殘卷。

1932年，王靜如著《西夏研究》第一至第三輯，分別對北京圖書館所藏靈武出土的西夏文《現在賢劫千佛名經》卷下殘卷，《過去莊嚴劫千佛名經》，《佛母大孔雀明王經》，《金光明最勝王經》卷一、卷四至卷十作「夏梵藏漢合璧校釋」或考釋。在第一輯中有國學大師陳寅恪撰寫的西夏文《佛母大孔雀明王經夏梵藏漢合璧校釋序》。流入民間的，除羅雪樵曾撰寫過回憶文章外，1972年王靜如曾對其藏卷于《文物》撰寫《活字版西夏文〈華嚴經〉卷十一至卷十五簡介》對其藏卷作了介紹。

1973年，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史金波、應琳和北京圖書館善本部黃潤華又一次着手進行整理北京圖書館所藏西夏文獻，後因故未果。此後，史金波于1973年發表了《西夏譯經圖解》（《文獻》1979年第一期）；1981年發表了《西夏文〈過去莊嚴劫千佛名經〉發願文譯證》（《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一期）；1983年，史金波又發表了《金光明最勝王經序跋考》（《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二期）。以上都是對館藏出土西夏文佛經中經圖、發願文、序跋的譯釋與研究。1982年，史金波與黃潤華初步完成了北京圖書館西夏文文獻的整理，于1985年發表了《北京圖書館藏西夏文佛經整理記》（《文獻》1985年第四期）。1988年，史金波把館藏西夏文佛經目錄收入其所著《西夏佛教史略》（寧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2002年，由史金波、王茵、全桂花、林世田編輯的《國內現存出土西夏文獻簡明目錄》列出中央與地方和臺灣的十四個收藏單位。其中首列中國國家圖書館文獻藏品一百三十一種。靈武出土西夏文佛經為九十九種。2003年，史